

#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sup>\*</sup>

陈武强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甘肃合作 747000)

**摘 要**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关键词** 北宋 真宗、仁宗时期 甘青藏区 民族立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0)02-0008-04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北宋王朝西北边防形势十分严峻,西夏李元昊 1038 年称帝使得宋夏矛盾升级,此后双方军事冲突不断,宋辽虽然于景德元年(1004 年)达成停战议和协议,但双方矛盾也时有发生,北宋西北边疆安全不容乐观。为对抗西夏,北宋竭力争取地处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治势力。因此,时散居于今之甘肃、青海等广大地区的吐蕃诸族成了北宋王朝极力经营的对象,这些甘青吐蕃诸部(统称为“蕃部”),在唐末安史之乱后乘机占有河西、陇右之地,“自仪(今甘肃华亭县)、渭(今甘肃平凉市)、泾(今甘肃泾川县)、原(今甘肃镇原县)、环(今甘肃环县)、庆(今甘肃庆阳市)及镇戎(今宁夏固原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暨于灵(今宁夏吴忠县)、夏(今陕西横山县)皆有之。”<sup>[1](P14151)</sup>而分布于湟(今青海乐都县)、鄯(今青海西宁市)、廊(今青海尖扎县)一带的吐蕃种类,亦“莫知其数”。据研究,北宋时期居于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人口总数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参见白自东、任树民:《宋代藏族人口蠡测》,《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年)。这些蕃部曾一度在河湟、陇右地区建立地方性民族政权,尤其以青唐吐蕃唃廝囉政权和西凉府吐蕃六谷部的势力为盛,是宋夏金

时期极其重要的西北地方政治势力。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卷三云:“唐末,西北蕃在者有回鹘、吐蕃,而吐蕃又分为唃廝囉,始甚盛强,自祥符间,绌于三都谷,势遂衰弱,视中国为神明,惕息不敢动。异时,与回鹘皆遣使,自兰州入镇戎军,以修朝贡。及元昊将叛,虑唃廝囉其后,举兵攻破英州诸羌,南侵至于马衔山,筑瓦川会,断兰州旧路,留兵镇守。自此唃廝囉不能入贡,而回鹘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为边害。朝廷虑之,议者以为唃廝囉尚在河、隍间,又与元昊世仇,尝遣使通谕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后顾之忧,则边备解矣。仁宗然之。宝元二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涣自古渭州抵青塘城,始与唃廝囉遇,涣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统爵命授之,俾掎角以攻元昊。”<sup>[2](P33)</sup>

可见,真宗、仁宗时期,北宋政府特别强调对青唐吐蕃唃廝囉政权的“笼络”,其目的在于使“掎角以攻元昊”、即实现“联蕃制夏”的西北边防战略,以减轻北宋西北边患的压力。为此,真宗、仁宗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实施“绥怀恩远”的民族政策,对甘青吐蕃诸部尽力“笼络”而为之用,另一方面又着力完善对他们的管理措施,尤其注重从法律上加强约束和统治,先后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吐蕃等诸族的

[收稿日期] 2009-07-06

[作者简介]陈武强(1966-),男,甘肃通渭人,现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及民族法制史。

<sup>\*</sup> 此文为 2008 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项目《宋代甘青藏区民族法律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813-05)。

民族法律法规,兹述如下。

## 一、颁行“本土专法”

真宗、仁宗时期,北宋政府对甘青吐蕃诸部“因其俗”而治,法制贯彻从俗原则,因而,民族法律法规主要以“本土专法”,即民族习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蕃族内部的纠纷和矛盾不通过宋汉区法律同一处罚,主要以“蕃法”和断解决,“文州(甘肃文县)蕃族有复仇者,当以蕃法论。”<sup>[3](P175)</sup>其原因是用“本俗法”即“蕃族习惯法”和断解决蕃族事务作为避免矛盾升级、实现“联蕃制夏”的手段之一,它将有损于该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稳定。“联蕃制夏”的西北边疆政策,其实早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就已有了初步设想,“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建议,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惟西凉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议,拜潘罗丐为西凉节度使,旁泥埋为驩州防御使,俾犄角攻讨,卒致继迁之死。”<sup>[4](P72)</sup>到了真、仁两朝,“联蕃制夏”已正式确立为宋朝治理甘青蕃族的核心政策之一,两帝都曾屡颁诏令,对于西北蕃部民众要“务令安集,抚宁部落”<sup>[1](P14152)</sup>,而西北边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贯彻北宋中央之民族政策,史载:“庆历中,滕子京守庆州,属羌数千人内附,滕厚加劳遗,以结其心。”<sup>[5](P4)</sup>“世衡初至涧城,抚养羌属,亲入其帐,得其欢心,争为之用。寇至,屡破之。”<sup>[6](P171)</sup>

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真、仁两朝累降宣谕,强调对甘青蕃族等少数民族法律纠纷的处理原则:“若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sup>[7](P2920)</sup>即以“蕃法”或“本土法”和断解决蕃族内部之矛盾。景德元年(1004年)野鸡族侵掠环庆界,真宗诏“边臣和断”<sup>[8](P14146)</sup>;景德四年(1007年)獫狁、美族人怀正“又与獫互相仇劫,侧近帐族不宁”,真宗派使臣“召而盟之,依本俗法和断。”<sup>[9](P14147)</sup>又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杨知进“正月与译人郭敏伴送翟符守荣般次赴甘州,缘路为浪家、禄厮结家、乞平家、尹家所钞夺之,争斗及和断。”<sup>[9](P7717)</sup>于是,吐蕃居民如违法犯罪,一般情况下是以纳钱或纳物的方式代为处罚,景德二年(1005)诏“蕃部罚纳,献送羊马。”<sup>[10](P1335)</sup>天圣三年(1025年)“蕃部因罪罚羊者,旧者输钱五百,比责使出羊,而蕃部苦之。自今请复令输钱。”<sup>[11](P2388)</sup>同年又规定,“蕃部犯罪者,可纳钱为赎,罪轻者,也可依汉法赎金(即铜)。”<sup>[12](P7257)</sup>

有宋一朝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和断”政策在甘青蕃部地区能较长时间地实行,虽然在北宋后期,宋廷加强了对甘青吐蕃的“汉法”管理力度,规定蕃汉相犯论如“汉法”,蕃部地方区域法

的特殊性逐渐减轻,但不可否认的是,北宋辖内甘青地区蕃部聚居区以“蕃部习惯法”处理民族纠纷的现象仍然存在。

## 二、订立行政法规

北宋沿袭唐朝的制度,在西北缘边的陕西、河东路及后来开拓的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兰(今甘肃兰州市)、岷(今甘肃岷县)诸州新边地区,对分布众多的吐蕃等内属部落民族,通过加封土蕃部族首领担任职名大小不等的各级“蕃官”,达到“绥怀族帐、谨固疆界”统治边区的目的。蕃官主要由部族首领演变而来,另外还有相当一些因功被授的一般部民,“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sup>[13](P76)</sup>出于复杂的民族问题和边疆安全形势之考虑,北宋政府经常通过对吐蕃首领的封官赏赐化解边区各种矛盾、稳定边地统治,景德元年(1004年)朝廷告谕灵(今宁夏吴忠县)、夏(今陕西横山县西)、绥(今陕西绥德县)、银(今陕西横山县东)、宥(今陕西靖边县东)等州蕃族,“能率部下归顺者则授予团练使等、赐银万两,其军主职员外部,将校补赐有差”<sup>[14](P1129)</sup>。

蕃官的任选也叫蕃官除授,由兵部统一掌管。宋真宗时期,曹玮在甘肃泾(今甘肃泾川县)、原(今甘肃镇原县)蕃部熟户中推行蕃将族内授职制度,“属羌百帐以上,其首领为本族军主,次为指挥使,又其次为副指挥使,不及百帐为本族指挥使。”<sup>[15](P9888)</sup>该制度是根据吐蕃部族首领所统辖人口的多少来任命各级蕃官的,蕃官职名从军主到本族指挥使大小有别,这种蕃官除授的初步探索为以后蕃官的职名、品级等各项政策逐渐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标志着在甘肃蕃部地区蕃官除授及其民族官员任选制度的初步法制化。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九月,曹玮上疏“沿边熟户,近为唃廝囉所诱,又立遵辈许以名职,若无羁縻,或虑胁去,望给以告身。”<sup>[16](P2011)</sup>同年十一月,曹玮又说,三阳、定西、伏羌、静戎、冶坊、三门等七寨熟户蕃部,“都首领已下凡一百四十六人有功,乞赐告身。”真宗诏:“二人授都军主,四十一人授军主,五十七人授指挥使,余悉补蕃官。”<sup>[17](P2026-2027)</sup>仁宗庆历初,甘青蕃官行政队伍已十分庞大,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帐之首领,各有职名”,而环庆路“熟户蕃部约及二万人,内只蕃官一千余人,各有请受。”<sup>[18](P1378)</sup>

北宋政府规定蕃官职名后代可以承袭,承袭范围广及周边诸族,“初补授等,北界、西界、湖南、湖北、川峡、陕西、河东路蕃官承袭,降宣诸路蕃、瑶人

承袭并纳土归明。”<sup>[19](P2504)</sup>在原有部族世袭制的基础上,北宋政府对蕃官子孙承继者在年龄、资历和职名品位等方面做了一系列规定,最早对蕃官承袭作出规定是在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诏秦州蕃官老疾者,听期子孙降两资代之。”<sup>[20](P4164)</sup>就是说,甘肃秦州之蕃官或老或病者后代可承袭职名,但需降两级方可替代。不过,这种降两资承继的原则并没有实行多久即发生了变化,“蕃官诸族首领物故者之子孙弟侄,旧制须年及十七、本族及二千户者,方得承袭职名,仍降一等;自西贼破荡以来,族帐凋耗,请自今更不降等,仍便许承袭。”<sup>[21](P3024)</sup>从之。可见蕃官承袭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一是年龄17岁以上,二是本族人口应达到2000户。新的承袭法还对职名的升降问题作了明确修订,可能由于战争引起蕃部人口的减少,嘉祐元年(1056年)之后蕃官法改为,蕃官子孙承袭父祖辈职名不再降级。

政府所授蕃官,如果率部叛逃、违法犯法则会被处以行政或经济处罚,轻为罚款、羁管,重则撤职、叛刑直至处斩。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前秦州司马张从政因为“久令从政和断蕃部,反与部落协比,以邀姑姑息”,被“黥面配梅州,本城遇赦不得还。”<sup>[21](P2024)</sup>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保安军蕃官胡守中叛逃西夏,“取还就诛。”<sup>[22](P4636)</sup>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因擅用“和断”之法,“环州(今甘肃环县)都巡检内殿崇班柴元肃、平远寨监押右侍禁安镇并勒停,寨主陈玉淮南编管。”<sup>[23](P3857)</sup>但为了拉拢吐蕃上层,宋廷对知错悔改的蕃官可给予赦免,如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叛逃蕃官茄罗、乌藏、策旺三族及咱伊军主率属表示归顺,真宗即诏“宥之,给其马直。”<sup>[24](P1255)</sup>不予追究。

### 三、制定蕃汉经济贸易法规

真宗、仁宗时期,受宋夏、宋辽关系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甘青蕃部地区蕃汉经济贸易活动总是时断时续、变化无常。为了规范边贸活动、维护合法的藏汉贸易,同时严厉打击蕃部地区吐蕃与汉民之间、蕃民之间及其番商跨境私贸易违法犯罪行为,北宋先后制定了许多甘青蕃部地区经济贸易法规。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审刑院制定的《秦州私贩马条例》规定,“自今一匹杖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加一等,三十匹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sup>[25](P1117)</sup>这个法令有两个基本特点,1、如在甘肃秦州私贩马者,不论蕃族、还是汉族均将受到严惩;2、以私贩马的多少作为量刑定罪之标准,罪分四等、重者上报朝廷严办。《秦州私贩马条

例》说明政府对藏汉缘边马政问题极为关注,原因是蕃马及其来源事关北宋朝廷西北军事战备和国防之安全。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诏:“秦州诸人自今或与蕃部买卖并各将钱物交相博买,不得立限赊买及取觅债负。诸色人公然于蕃部取债及负蕃部钱物不还者,即追领正身,以所欠钱物多少分等定罪,并差人监督催还,偿还全部债欠,如果欠蕃部钱物较多且量情理属欺诈者”,即使正身逃脱,也要“追禁亲的骨肉及一面紧行追捉,候获日,依格法断遣。”<sup>[26](P7258)</sup>此为《景德法令》,法令显然对吐蕃在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

另外,由于景德以来“环庆边人多市属羌之田,致单弱不自给,即没敌中。”<sup>[27](P96)</sup>土地买卖现象渐趋普遍,及宋仁宗继位,“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sup>[28](P4164)</sup>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土地买卖已构成对甘青蕃族人户基本生存的严重威胁进而影响到北宋在西北蕃部的统治,故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北宋政府颁布了严禁蕃部土地买卖的《土地条例》,“(陕西)汉户弓箭手,不得私典买、租赁、合种蕃部地土”,如有违犯,原“典买、租赁、合种百姓弓箭手并科违制之罪,仍刺面配向南远恶州军牢城。”<sup>[26](P7258)</sup>

蕃部土地的买卖禁令是真宗、仁宗时期甘青藏区蕃汉经济贸易法令的核心内容,土地法之所以明确规定蕃人土地“止绝”买卖、侵占、合种及租赁,其根本原因在于“若却令蕃汉合种,未免被弓箭手、百姓奸倖侵欺,引惹边上不宁。”<sup>[26](P7258)</sup>即不能确保蕃民基本土地的占有,则蕃族会因无地而流离失所从而引发边地骚乱,因此,若西北缘边汉民侵占了蕃部民众土地,除“科违制之罪”处以刺面、迁配之刑,还必须限期归还侵占蕃人之田。这种土地禁卖法令一直实行到北宋后期,宋神宗时期,随着开发西北边疆的活动,宋统治者把允许蕃汉民户土地买卖看做是实现变夷为汉、同化蕃族的途径和手段,如王安石说,“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缘此本皆汉人故也。……蕃部既得为汉人,蕃部贱土贵货,汉人得与蕃部交易,即汉得土,蕃部得货,两各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sup>[29](P5655)</sup>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北宋首次宣布取消在甘肃、青海和陕西等藏区的蕃部土地买卖禁令。

### 四、订立特别民事法规

为了确保甘青藏区社会稳定,宋真宗、仁宗时期,北宋还订立了一些特别民事法规,对蕃部民众在生命、生存和司法等方面的合法权利施以法律保



护。

首先,对蕃族生命权的保护。生命权是人最主要的生存、生活的权利,北宋对蕃族生命权的保护措施,主要表现在禁止枉杀、滥杀无辜蕃民以及对这些行为的处罚。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经过再三考虑,诏令“自今斩获蕃族首级,须辨问的实,当行杀戮者,许依前诏给赏,如其非理,即以军法论。”<sup>[30](P1420)</sup>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曰:“盖抚御戎夷,当务含容,不然,须至杀伐,害及生灵矣。”<sup>[31]</sup>这种珍视生命、限禁杀戮的史料在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充分说明了宋统治者对蕃民生命的珍视和忧患。

其次,对蕃民人身权的保护。人身权是指人身不可分离而又没有直接经济内容的权利,它既包括生命健康、姓名、人身自由等在内的人格权,也包括如亲权、监护权在内的身份权。真宗、仁宗时期,宋廷注重通过法律手段对西北缘边蕃民的人身基本权利给予保护。按照宋期法律,边地蕃民犯罪可以依据蕃法“和断”处罚,但和断后又恐其“异时复叛”,因此,实行“收其子弟为质”的纳质制度。史载,西北沿边府、州、军几乎都设有纳质院,甘肃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有质院,质诸羌百余人,自少至老,扃系之,非死不出。”<sup>[32](P9451)</sup>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马知节知秦州时,秦州“尝质羌酋支属余二十人,逾二纪矣。”马知节说,“羌亦人尔,岂不怀归?”<sup>[32](P9451)</sup>马知节将原诸羌质子全部遣放,“诸羌德公,乞去无一人犯塞。”<sup>[33](P160)</sup>这充分反映出废除限制人身自由的“纳质制度”是众望所归。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针对纳质造成禁锢终身的现象,宋真宗下诏“释西面纳质戎人。”<sup>[1](P14158)</sup>另,按宋法律之规定,判迁配刑者年老或疾病时可得以释罪,但同时又规定,蕃族犯者“悉留不遣”,以免返回蕃部再聚众反叛,故而蕃族得释者只能留在服役地劳动、终身不能回家。仁宗诏废此法,说“远民无知犯法,而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乎!察其情有衿者,听遣还。”<sup>[34](P2400)</sup>

再次,真宗、宗仁时期还十分注重对蕃民在司法诉讼中合法权益的保护。那些在审理案件中不能秉公处理、依法判决的官吏,北宋政府严加惩治。景德元年(1004年),西部缘边州军所管熟户蕃部“或有斗讼,官吏不能遵守条例,依理平决,或旁缘骚扰,致生边隙”,真宗诏“自今转运副使常切按察,其不能绥边勤职者,具名以闻。”<sup>[35](P1254)</sup>以上诸法,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蕃族弱势群体生命的珍视和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宋朝社会救助和保障法制的日臻完善,“麟府州汉户之单丁与蕃族之内附而遇歉者,檄有司蠲其役且著为令。”<sup>[3](P174)</sup>

这种因时而易、因地制宜的民族法律政策,对甘青地区民族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总之,与北宋在甘青蕃部地区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佐,宋真宗、仁宗时期制定和颁行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地区的民族法律法规,这些民族立法,其实也是北宋王朝在宋夏、宋辽沿边基本民族政策的全面体现,它对于加强北宋在西北甘青藏区的统治稳定、缓和蕃部诸族矛盾与纠纷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内容上看,甘青蕃部地区民族法律法规比较全面地涉及北宋在蕃民族聚居区的行政、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处刑原则上看,它们典型体现着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点,因为为使西北缘边社会稳定,真宗、仁宗两朝一再强调用“民族习惯法”处理蕃部事务,蕃人违法以“和断”罚纳处罚,所谓“旧羌杀边民以羊赎其死”<sup>[21](P96)</sup>、“黠羌杀人,辄以羊马自赎”<sup>[36](P665)</sup>;从法的执行和实施看,“轻法”论罪的特征到处可以显见,这不仅反映在“和断”之法的颁行和实施,更重要的是,真宗、仁宗时期“赎罪”、“赦免”之法的广泛运用,史载,景德元年(1004年),“先叛去蕃官茄罗、兀臧、成王等三族及者移军主率属归顺,请献马赎罪。诏宥之,给其马直。”<sup>[37](P1255)</sup>种世衡知环州(今甘肃环县)时,“凡边民有过,则使之射,四发二中者,释其罪。”<sup>[27](P193)</sup>说明掌握了某种技能或技术的蕃汉犯法者还可获得免罪,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理念在刑罚中的体现,它与当代倡导建立“和谐法制”社会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当然,法律终归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真宗、仁宗时期对甘青蕃部地区的民族立法,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保障统治者的阶级利益,尽管蕃族犯法者被给予了赦免减刑、宽法论罪的较多机会,但威慑甚至杀戮的暴力方式依然尚存,加之量刑论罪中的某种混乱和执法处罚的不公平现象,都反映出其难以避免的弊端和阶级本质问题。

#### [参考文献]

- [1][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宋]魏泰.东轩笔录.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宋]吕陶.净德集.卷21《枢密刘公墓志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 [4]《东轩笔录》卷15[M].
- [5][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9[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八月戊辰[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宋史.卷491《夏国传》[M].

(下转 39 页)

乡村旅游有利于增强当地居民的商品意识,促进其价值观念的转换,推动乡村地区的对外开放,带动乡村地区社会经济的文明进步。在西藏的边远、贫困地区,农牧民通常文化水平较低,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他们很难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缺乏资本积累观念。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打破边远、贫困地区原有的封闭状态,引进人员、信息、商品的大流动,进而是技术、文化的流动,这将促使当地农民与外界广泛交流,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识,丰富他们的语言,更新他们的观念,进一步改变他们旧有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文化素养、经营理念和技能等都得到提高<sup>[7]</sup>。

综上所述,发展乡村旅游对于西藏的和谐社会构建来说,可谓是意义重大。但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说,西藏的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滞后。具体表现在:乡村旅游点的规模不大,数量不多,所能提供的吃、住、行、游、购、娱等系列旅游产品数量少而质量不高,参与经营的农牧民人数不多……。相对滞后的西藏乡村旅游现状制约了其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基于西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基于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西藏各级政府应切实把

乡村旅游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大力推进其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不断再上新台阶。

#### [参考文献]

- [1] 罗布次仁. 今年 1-9 月西藏累计接待游客 475 万人次[EB/OL].[http://www.cnr.cn/newscenter/gnxw/200910/t20091012\\_505506246.html](http://www.cnr.cn/newscenter/gnxw/200910/t20091012_505506246.html) 中广网 2009 年 10 月 12 日.
- [2] 西藏发展乡村旅游的特点与对策[EB/OL]. 同程网 2008 年 10 月 29 日. [http://www.17u.net/bbs/show\\_71\\_888800.html](http://www.17u.net/bbs/show_71_888800.html)
- [3] 西藏 2007 年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 2.2 亿元[EB/OL]. 农博网 2008 年 1 月 2 日. <http://county.aweb.com.cn/2008/1/2/480200801021327960.html>.
- [4] 杨晓梅, 张敏等. 如何提高西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本领[J]. 西藏农业科技 2008(3).
- [5] 王文长. 西藏乡村的出路: 经营乡村[J]. 中国藏学 2006(2).
- [6] 余昊.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动作用研究[Z]. 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
- [7] 单琼花, 王琨, 葛冬. 乡村旅游的特点及在民族地区开发中的意义[J]. 安徽农业科学 2008(36).

[责任编辑 毛阳海]

[校 对 梁成秀]

#### (上接 11 页)

- [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 4 之 7, 中华书局 1957.
- [10] 李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60, 景德二年五月辛亥[M].
- [11] 李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03, 天圣三年九月庚辰[M].
- [12] 宋会要辑稿 兵 27 之 22[M].
- [13] 澠水燕谈录 卷 6, 第 76 页[M].
- [14] 李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56, 景德元年二月戊午[M].
- [15] 宋史 卷 258 《曹彬传附曹玮》[M].
-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88,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壬寅[M].
-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88, 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丁未[M].
- [18] [宋]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 卷 125, 王尧臣《上仁宗乞用泾原路熟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9] 宋会要辑稿 职官 6 之 15[M].
-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73, 皇祐四年七月戊辰[M].
- [21] 李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84, 嘉祐元年九月丁未[M].
- [22] 李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92, 嘉祐五年七月壬寅[M].
- [23] [清]许松辑. 宋会要辑稿 职官 65 之 22[M].
- [24]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57, 景德元年八月丁亥[M].
-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51, 咸平五年二月甲午[M].

- [26] 宋会要辑稿 兵 27 之 23、24[M].
- [27] [宋]曾巩. 隆平集 卷 9[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8] 宋史 卷 173 《食货》上 1[M].
-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233, 熙宁五年五月辛卯[M].
-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63, 景德三年八月丁酉.
-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68,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壬申[M].
- [32] 宋史 卷 278 《马知节传》[M].
- [33] [宋]杜大珪. 名臣碑传琬琰录 上卷 19[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4] 李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04, 天圣四年春正月庚子[M].
-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57, 景德元年八月庚辰[M].
- [36] [宋]宋庠. 元宪集 卷 34 之 5 《曹玮墓志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7] 李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57, 景德元年八月丁亥[M].

[责任编辑 孙 林]

[校 对 梁成秀]

## The Origin of Oirat Mongol Tribes in Qinghai (II)

Written by Satotyo (Japan), translated by Meng Qiuli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es, pastoral areas and chiefs' lineage of various Mongol tribes in Qinghai, this paper focuses on Khoshut Tribe, discussing its historical transition and the process of being absorbed into Manchu Eight-Banner System after Lobzang Tenzin's rebellion.

**Key Words:** Qinghai; Khoshut; Eight Taijis; Pastoral Areas; Lineage

##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 towards Gansu and Qinghai Tibetan Area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and Renzo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en Wuqiang  
(Gansu Teachers'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Hezuo, Gansu, 747000)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and Renzo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of Northern Song took various measur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Gansu and Qinghai Tibetan areas in order to confront Western Xia. Conforming with the policies of 'Stabilizing the borders with favor and trust' and 'Containing Western Xia in alliance with Tubo', legislativel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made numerous national laws aiming at Gansu and Qinghai Tibetan areas, ranging from administration, economy and cultur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historical roles of these laws in the stability of Gansu and Qinghai Tibetan areas.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and Renzong; Gansu and Qinghai Tibetan areas; National Legislation

##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Policy of Titles Granting to Tibetan Monks for Conciliation by Zhu Yuanzh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Zhang Anli  
(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Huaiyuan County, Anhui, 233400)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ing Dynasty, Zhu Yuanzh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endeavored to restore the order of the feudal society and ease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he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reigning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With regards to Tibet, he took the policy of titles granting to Tibetan monks for conciliation, which yielded satisfactory effects for the stability of Tibet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Zhu Yuanzh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ibet; Titles granting to Tibetan Monks for conciliation